第一章　绪论：清末的政论报刊与政治思潮

清末政治思潮的开展及演变，与政论报刊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政论报刊之目的与功能在于造成舆论，藉此以推动政治变革。在辛亥（宣统三年，1911 年）武昌起义前十余年间的政治运动中，政论报刊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既促使变法维新要求的高涨，又助长革命排满势力的伸张，而新旧思想的冲突以至革命派与君宪派的对抗形势，也不能不说是随着报刊言论的激荡而深化。

一般来说，报纸主要是刊登新闻，杂志则揭载评论；至于材料的选择，报纸是一般性的，杂志是比较特殊的。①但中国早期的报纸和杂志，无论内容、形式以及对于社会的作用，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没有明确的区分，所以统称为“报”或“报刊”。所谓“政论报刊”的主要特点，顾名思义，是以议论政治为主，因此“论说”一栏最受重视，而新闻报道反居于次要地位，这与商业性质的报纸和以后进入企业化时代的报纸，是颇不相同的。②

近代中国最早具有政论性质的报刊，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间维新人士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创办的《中外纪闻》及《强学报》，虽然出版未几即告停刊，但已肇人民公开发表政见之先河。在此以前，除《官报》外，绝大多数的华文报刊，都是侨居中国的欧美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士于发行外文报刊之余而创设的，由中国人自办的寥寥无几；且社会上阅报风气未开，报纸的地位并不受到重视，要到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年,1894 年)后“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藉报纸以发抒其意见”③。政论报刊遂应运而生，很快便成为知识人士吸收同志、鼓吹主张的重要工具，不但造就了中国报业的发展，更开创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崭新的局面。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间，汪康年（1860～1911）、黄遵宪(1848～1905)、梁启超(1873～1929）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其内容“率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盖至是而吾国始有论政之杂志”④。出版以后，风行一时，备受各地的新学士子欢迎，“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⑤。澳门《知新报》（初时是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及长沙《湘学新报》（旬刊，后改称《湘学报》)等继起,互相应和,汇成了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变法运动的热潮。⑥维新人士之所以如此着意于开办报馆，乃因他们认定“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⑦。而‘欲开〔学〕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⑧。《时务报》创始，即已宣称“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⑨。严复(1854～1921)、夏曾佑(1863～1924)等后一年在天津发行的《国闻报》(日报),亦谓其目的‘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日通中外之故’⑩。他们既领会到报刊的力量，因此利用报刊作为宣扬其主义的媒介，遂不遗余力，办报一事也就无形中成了维新人士活动的枢纽。

及至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主编《清议报》（旬刊)与《新民丛报》(半月刊)于横滨,继续从事文字鼓吹工作。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间，上海的革命派报纸《国民日日报》以

《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三种刊物为代表,划分戊戌前后国民思想精神变化的进程为变法、保皇、立宪三个时期。[11]事实显示，这些杂志曾经成为社会潮流的启蒙及主导力量，使新思想、新知识得以较普遍地传播，扩大了知识人士的眼界，并加强了他们的国民观念和变革热望，所以不失为反映时代趋向的代表性出版物。

如上所述，最初的政论性报刊，都是维新派人士所创办的。至于早期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志士如孙文（中山，1866～1925）等，由于偏重实际行动，忽略了文字方面的鼓吹，且兴中会于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成立之初，文人墨士颇为缺乏，所用的宣传册子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二篇而已,尚未建立正式的言论机关。[12]自从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广州一役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规划革命，重图大举，渐知创设宣传机构为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乃于己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派遣陈少白(1869～1934)至香港发行《中国日报》，由是始有革命报纸面世。[13]

革命思想亦萌兴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之间，早在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际，留学界已有倾向革命的言论出现，是值得注意的一事，因为中国国内早期革命思想的胚胎，多少乃承接此脉络而来。当时留学生不满百人，但“人人皆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而主张根本改革之激烈论者，殆过半数”。是年留学界开始发行《译书汇编》月刊，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民约论》、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万法精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自由原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代议政体》等，逐期刊登。随后又有《开智录》半月刊的出版，专发挥自由平等学说。这两种杂志对于启迪知识青年的思想

都有相当的功劳。秦力山(1877～1906)、戢翼翚(元丞,1878～1908)等复于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发起《国民报》月刊,鼓吹民族主义,措辞颇为激烈,开留学界革命报刊之先河,但因经费不足,出版仅数月,即告停刊。次年年底,戢元丞继办《大陆报》月刊于上海,倡议改革,排斥保皇,可以说是上海最早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刊物。[14]

可是,在当时国内外的环境下,革命言论的展开,殊不容易。戊戌前,所谓士大夫读书阶级,差不多完全是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维新派的地盘基础;[15]变法虽然失败,但他们继而提出的保皇、立宪主张,在思想界中仍有一定影响。而且,革命人士初时所依靠的,主要是海外华侨社会及会党势力,在国内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大的支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康有为于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后,在海外声势大增,更夺去了不少革命的据点。"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16]留学界的现象,仅为革命事业透露了一点曙光,要把革命思想向国内灌输,实是一项艰困的工作。

上海是中国沿海中部的一个大城市,又是重要的交通孔道,鸦片战争(道光二十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后,辟为通商口岸,英、法并相继设立租界于此。由于地理环境及华洋杂处的缘故,上海也就很快成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一大集合点,具有较特殊的社会形态。开埠不久,外侨因鉴于商业贸易的需要,很早已有外文报纸的创办,后来更因他们与华人的商业关系日渐密切,所以又经营起华文报纸来,同治十一年(1872年)创刊的《申报》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创刊的《新闻报》均为日报中的重要代表。这些报纸的内容,初时都偏重于报道有关贸易事情及宣传商品,不但没有中心的主张,也不敢涉及政治问题,只是当作与华人贸易的一种工具

而已。[17]

甲午以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大量出现，使上海顿成全国出版事业最蓬勃的地方。是时具有开创一时代风气意义的刊物，应首推《时务报》，已如前述。但该杂志因汪、梁二氏交恶及戊戌年六月(1898 年 7 月)清廷下诏改为《时务官报》而告终,汪康年另设《昌言报》,其体例皆仍《时务报》之旧,政变发生后,旋即停刊。而早在是年闰三月(5 月)间,汪氏还另外发行了一种《时务日报》,以记载中外大事、评议时政得失为主,锐意革新,图与《申报》竞争,随后改名为《中外日报》，政变以后仍继续出版，成为上海主要的日报之一，其言论由始至终，大抵不出变法维新的范畴。[18] 此外,庚子间，日人田野橘次创《同文沪报》(日报),鼓吹改革,与唐才常(1867～1900)在上海组织正气会（自立会）及召集维新志士，颇有密切关系。[19] 总言之,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上海的几份主要日报，如《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及《同文沪报》等,都不是革命报纸,甚至对革命活动予以严厉的抨击，可见当时比较开明进步的上海言论界仍是颇为保守的，更遑论国内其他地方了。

不过，知识人士对国事的关心日益普遍，实为革命造成一种新的形势。他们由于受了戊戌维新失败及庚子义和团事件的刺激，痛感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开始群趋于救国的政治运动，“而革命风潮从此萌芽矣”[20]。维新以后京师与各省学堂的设立，和庚子以后出洋留学风气的盛行，更使知识人士有了集中一地的机会，在新知识、新思想的激荡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觉悟性的新知识群。[21] 他们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及民族意识，对于国家处境与政治形势的反应极度敏感，思想和言论均十分激进，因此对于旧社会的不满情绪以及希求变革的欲望，也最为明显易见。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之际,国内外学潮的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起云涌，实反映了这一新知识群体的兴起及扩展。

学潮的出现，肇始于留日学生界。因为庚子以后变法的要求益切，而所有新政又需人办理，地方政府遂相率有留学生的派遣，其中以前赴日本的居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留日学生已有六百余人，次年即骤增至一千三百余人。[22]这两年间,先后有‘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发起，“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东京留学生反对清使馆拒绝保送私费陆军学生）的发生，及“拒俄学生军”的组织等等。在国内，学潮也日益澎湃，首先是上海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在张园举办“协助亚东游学会”，不久，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等相继发生退学事件，而类似的情况，更遍及全国各地。同时，国内外的知识青年，又借着出版书报和各种机会，互为呼应，声势日益浩大，正如孙中山所说，“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而演成革命风潮初盛的时代。[23]

其实这些爱国的新知识分子，起初他们的思想并不是革命的。例如留学界最先的进步刊物《译书汇编》及《开智录》“;都还没有提出革命的或其他的激烈主张，同改良主义者的政治分野实际上还不明显”;事实上《开智录》创办人之一的郑贯公（贯一，1880～1906),是《清议报》的助理编辑,因此言论虽然缓急有差,但仍不是革命与改革之别。到《国民报》出现，才“反映了新从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虽未正面地提出反满革命的主张，却认为革命党人所抱的颠覆自命宗旨既美且正，可见已有了强烈的革命倾向。此外，留日学生在癸卯(1903年)创办的几种带有地方色彩的月刊,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和《江苏》等，都着力于介绍世界局势及指出中国危机，企图借着输入外国新知，催促国人发奋图存；换言之，这些留学生刊物都是从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出发，初时并没有宣传排满和革命。[24]

虽然如此，新知识群急激地趋向革命，且成为清季革命势力中重要的一环，则是明显的事实。论者自以为，在辛亥革命中，会党分子、商人、华侨等虽担任了角色，但主要的推动力实来自学界；[25]或更清楚地指出，学界中的革命知识分子集结在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主导思想之下，领导革命活动，最后推翻了满清政府的统治。[26]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多置其重点于急进知识分子跟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27]而多少忽略了新知识群整体性推移的情况，以及这一群体在趋向革命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形态等等。这些问题，将在下文通过具体的事实引证，予以申论。此处仍需指出，新知识群与政论报刊二者息息相关及互为因果的现象，亦颇可注意，理由是新知识群一面既受了进步书报的影响而加速成长的脚步，同时他们又发行更多新的刊物，以巩固和扩大其社会基础。

总的来说，庚子至壬寅（1900～1902 年）的几年间，中国的革新势力大体上仍为康、梁的论调所左右，但一个倾向革命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正在酝酿形成，不过尚未正式揭起革命的旗号。而唯一声称革命言论机关的《中国日报》，“初以不审英人对华政策所在，一时未敢公然高唱革命排满之说，半载后措辞始渐激烈”[28]；又“因操笔政者，短于欧美新思想，颇不为学者所重视”[29]。在早期的革命运动中，事实上并未能有效地负起鼓吹革命思想的任务。结果，癸卯（1903年）间，在上海异军突起的一家革命报纸，竟是并非由革命人士所筹办的《苏报》（日报），其言论至为激烈，震惊朝野，随后由于清政府的压制，酿成了举国瞩目的“苏报案”。自此江浙一带的政治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苏报》清楚划分了革命与改革的思想界线，并配合着时局的发展，催促了知识人士急剧地向革命转化，使革命形势顿为改观。

而且，《苏报》的主张前后迥异，由变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

命,草蛇灰线,层级井然”㉚。其转变的经过，充分反映出晚清政治思想的演化和趋向。下文即以《苏报》为主要线索，探讨癸卯前后中国思想界的情形，分析《苏报》与清末政治思潮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对于这份报纸的历史地位，给予全面性的评价。

注释：

①参阅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年；香港：太平书局,1964 年重印本),页 5。

②参阅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上册（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 年),页 191～193。

③同注①，页 176～177。

④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卷 2(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页 12a。

⑤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清议报》第 100 册(日本横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 年 12 月 21 日),页 4b。

⑥ 参阅汤志钧《戊戌变法时的学会和报刊》，氏著《戊戌变法史论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页 149～250。

⑦ 梁启超《变法通议》之十三《论学会》,《时务报》第 10 册(上海),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1896 年 11 月 5 日),页 2b。

⑧ 梁启超《与穗卿〔夏曾佑〕足下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五月,引自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58 年),页 25。

⑨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 1 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 年 8 月 9 日),页 1a。

⑩ 《国闻报缘起》,见《中国报学史》,页 145 附注。

⑪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国民日日报汇编》第 3 集（上海：东大陆译印所,光绪三十年,1904 年)“社说”,页 31～37。

⑫㉙ 参阅冯自由《革命初期之宣传品》,氏著《革命逸史》第 1 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 年重印本),页 17。

⑬㉘ 参阅冯自由《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革命逸史》第 1 集,页 98。

⑭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 1 册（台北：世界书局,1954 年),页 54～55 并参冯自由《横滨开智录》、《东京国民报》、《东京国民报补述》及《励志会与译书汇编》,《革命逸史》第 1 集,页 142～147。

⑮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 年重印本),页 208。

⑯⑳㉓ 孙中山《孙文学说》第 8 章"有志竟成",《国父全书》(台北 国防研究院,1960 年),页 34。

⑰ 参阅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 2 卷第 3 期(1935 年 3 月),页 947～948。

⑱ 同注①,页 123 及 140 注⑥,页 254～255。

⑲ 参阅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 1册,页 67～69。

㉑ 参阅王德昭《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4 卷第 1 期(1971 年 9 月),页 111～113。陈庆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称这个新知识群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认为他们"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尾和二十世纪开头年代的新产物"见《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第 222 号(1961 年 10 月 11 日,北京)。亦参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年),页 40～57。

㉒ 参阅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1933 年 台北,影印本),页 46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年),页 84。

㉔ 参阅胡绳武、金冲及《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发展》，《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第 174 号(1960 年 11 月 26 日,北京)。

㉕ Mary Backus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 ~ 191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27.

㉖ 同注㉑,页 119～125。

㉗ 如 Mary Backus Rankin 前引书（注 25）及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㉚ 《苏报案纪事》(一名《癸卯大狱记》缺编者姓名及出版时地,台北 国民党史会影印本),页 1。

第二章《苏报》的历史及言论转变的经过

《苏报》初时“本一营业性质之小报”①，在上海新闻界中没有什么地位，②该报的早期历史，世人所知甚少，有关的记载多属互相转引，且说法亦不尽相同。由于缺乏详确足供参考的文献，实难以作深入的考证；不过，把现存的资料加以比较和分析，尚能找出大致的脉络及纠正若干错误。

关于《苏报》创刊的年份，有两种记载：一说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③一说是次年夏季。④向来学者都是任采其一，未予肯定孰是孰非。早期的《苏报》已经散佚，无从用实物证明，然而，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1903 年 5 月 6 日)《苏报》报端印有‘第二四五一号”字样，以后逐日顺次编号，据此向前推算，如果中间没有停刊过的话，《苏报》应创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六七月左右；若曾经中断，则最初发行的日期还要更早。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书首加插《苏报》图版一张，上面印有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五日(1898 年 2 月 5 日）及“第五七六号”字样，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推算结果的可靠性。近年出版的报刊史著作，则具体说《苏报》始自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1896 年 6 月 26 日)。⑤无论如何，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夏创刊的说法是不对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苏报案纪事》应是最早记述《苏报》历史的著作，可是该书只简单地说《苏报》“向为日本人所创办”⑥，交代得颇不清楚。戈公振（1890～1935）著《中国报学史》，始记载该报是“胡璋(铁梅)所经营，但由其妻日本女子生驹悦出名，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⑦. 再从其他资料，得知当初的主笔是邹弢（1850～1931）。⑧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间，邹弢向英租界公廨控告馆主生驹悦强迫撰稿索诈，生驹悦曾向邹弢说：“馆由东洋外部大臣来的，领事亦不能管我。我虽平常人，曾由胡铁梅在日绅日官前保举为馆主。”⑨因此，《苏报》更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外务省（外交部）在上海所设立的机关报。⑩但生驹悦这段话出于与人诉讼之时，是否全属事实或有夸大成分，现已无从确定，日本方面也不见有相关的记录，⑪所以，只可以说早期《苏报》在人事上或经济上与上海的日本人有若干关系，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九日（1903年5月5日）以前，该报兼用日本明治纪年，亦足为一佐证。由于上述原因，“故外称日人所设”⑫，但必不至于是日本政府的机关刊物。

《苏报》“在这样姿态下经营着，内容却不十分的好”⑬。报上“所刊消息议论，颇为无聊”。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间，曾因刊登黄色新闻与法租界公廨发生纠葛；次年又有前述主笔与馆主诉讼之事，可见名誉也很差。加上经营不善，颇有亏蚀，遂全盘出让，由一个叫做陈范（1860～1913）的举人购得，继续营业。⑭陈范原名彝范，字梦坡，湖南衡山人，本为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⑮其兄陈鼎（1854～1904）则因戊戌党事获罪，被判永久监禁。⑯陈范由是“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遂承办是报”⑰。以其妹婿汪文溥（兰皋，1869～1925）助理报务。⑱馆址初在英租界四马路望平街，后迁至棋盘街，最后则设在英租界三马路二十号。⑲据汪文溥回忆说：

> 丁戊〔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1897、1898 年〕之际，康有为始以维新号召徒党，君〔按：指陈范〕私谓余曰：“中国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盍偕我以文字饷国人，俾无再入迷途。”于是相与在沪组织一日报，此即壬寅〔按：应为癸卯〕以言革命被祸之《苏报》也。[20]

陈范如何认为康有为持论不当，已无从得知；但他承办《苏报》的原因，是希望借着文字宣传来挽救国家危堕的局面，则是很明显的，当时比较开明的官僚和知识人士心目中救国的方法，大抵不外如是。因为这个缘故，《苏报》便开始成为一家具有政论性质的报纸了。

至于陈范接办《苏报》究始于何时，说法并不一致。后人著作，有说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的，[21]但多数说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22]较为可信的资料有二：一是《苏报案纪事》，该书是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1903 年 7 月）“苏报案”发生后在同年内出版的，提及陈范接办一事，谓“至今将及四年”[23]，换言之，应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间；另一是汪文溥的回忆文字，说陈范和他接手《苏报》“适在戊戌政变”[24]。按政变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1898 年 9 月下旬），结合上两资料来看，《苏报》在这时或稍后至翌年间转由陈范主持，当属不谬。

此后，《苏报》即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上海报坛，“其主张日追潮流而进步”[25]，在当时的思想风气之下，逐渐受到注重。“初力主变法，颇为读者欢迎，嗣复中于康、梁学说，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26]《苏报》的若干论说，曾见于《清议报》及《新民丛报》等杂志的转载，[27]足以说明该报言论，亦颇受保皇立宪人士的重视，甚至引为同道。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光绪帝(1871～1908）被囚，慈禧太后（西太后，1835～1908)临朝训政,并拟谋废立,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 年 1 月 24 日）下诏建储，但海内外各地人士纷纷致电谏阻，上海绅商学界蔡元培(1868～1940)、黄炎培(1878～1965)等一千二百余人，推电报局总办经元善（1841～1903)领衔,联电抗争。[28]《苏报》及《清议报》、《知新报》也发表反对言论。[29] 从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清楚看到当时《苏报》“忠君保皇”的程度：

> 今皇上临御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无不向慕，无不爱戴，自戊戌八月政变，无日不翘首北望，期皇上之复权。读征医之诏，则蹙然以忧；读遣医之谕，则皇然以疑。天下方日以我皇上为念，而骤有往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储谕旨，则天下人心，安有不彷徨瞻顾，忧思涕泣，而不可止者乎！……今上拥虚位以立于群臣之上，临御二十六年，为天下所爱载〔戴〕，而忽成为缀旒、为闰位。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30]

此外,《苏报》的其他论说,亦充分反映出该报对当时政局的看法，例如《历诋篇》抨击身居高位的朝士大夫但求贪图一己的功名利禄，误国殃民，“前此之内难外衅，俾君民交受其困，实诸公贻之”。对主持军机处及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 年 4 月）新设立的督办政务处官员，尤加以严厉责难：

> 衮衮诸公，日从事于引用腹心，斩芟异己，联络外人，弥缝前隙，此外更有何措注乎。……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徒偶取一二无妨于其私计者，缘饰敷衍以欺天下，以示异于前此之顽固。推其心，国家可亡也，社稷可覆也；天家母子可隔阂

> 间阻，使中外议慈孝之未尽也；四百兆满汉种胄可利权尽失，生计日蹙，而牛马奴隶于异族也。惟其及身之富贵利禄，所以饫其气体、骄其妻妾、贻其子孙、庇其戚党、夸其乡里者，必不可使有一丝一毫之缺陷，其心目中殆以为举天下惟其身为足重。国之孱弱破败，而犹为人所撕裂；民之死亡流离，而犹为人所践踏；彼虽觏于目，接于耳，而无所动于心。

此文又批评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的所谓新政，仅是敷衍了事，完全没有更新的气象，军机处“则依然一前日之军机处，虽新设之政务处，亦依然一前日之军机处甚且褊私巧猾，招权树党，较前此为尤甚焉”。同时，还指出朝廷媚外态度的不当“：姑无论庚辛之衅启于排外，而祸机之伏不在排外，为人人所知也。试与取中外数千年历史观之，有内政之弊如今日，民生之困如今日，而仅以媚外足免危亡者乎。’[31] 其措辞锋锐，直斥官场中人的腐败无能，至为透切。

《各国变法功效考》同样指责新政推行的失败，可是错误地认为‘朝廷痛定思痛，屡以变法自强，号召天下”。不能洞悉清廷本身并没有真正变革的诚意，而把新政没有成功的理由，归咎于“各省之承流宣化者，徒有变法之名，毫无变法之实，未闻实行一政，副明廷诰诫之训，慰天下期望之心”。且其中心理念，仍不外乎是变法可致自强的论调，如说“日本之弊政，初不异于中国，一旦励精图治，遂驾中国之上，而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则变法之功效故也”，更强调‘复君权者，日本自强之本也”。中国‘苟能实心变法，则变法之功效，何遽不如日本哉’[32]。其实是想喻明，如要变法有成，就首先要恢复光绪帝的权位而已。

前文经已提及，在戊戌政变发生后的三四年间，比较开明的人士，仍多受康、梁思想的影响。《苏报》的议论，可以说是追随着这

一潮流，强调变法，倡议保皇，与康、梁等人的主张，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别。虽然流露了不满官场及时局的情绪，但主要是针对西太后主持下的措施，幻想着只要光绪帝复位，推行变革，则垂危的中国可以重新振作起来。当然，这时《苏报》在上海的言论界中，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其影响力绝对比不上《清议报》及《新民丛报》。

据汪文溥的回想，《苏报》曾因主张“斥君扶民为根本之解决，会胡运未终，吾人自安于蜷伏”，以致“读《苏报》者，辄诧为怪诞，经济乃大困”。陈范曾将报馆交给汪文溥负责，而自己则前赴河北筹款，经年始归；随后汪氏亦到湖南筹款，未几而有“苏报案”的发生。[33]由是得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1903 年 7 月）以前的一段日子，是陈范独自管理报馆事务的时期，究有多久，则无从推断。“报馆中经济既困，人才亦少，陈氏常拉人写论说。”[34]可见《苏报》的销路一直没有多大进展，直至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之际，即 1903 年初，始有转机，其原因诚如《苏报案纪事》所指出：“《苏报》之所以大张旗帜，实始于去年〔壬寅〕之冬，盖增入‘学界风潮’一门，乃大为阅者之所注目矣。”[35]报务自此日益发达，而报纸的内容也有很大变化。

根据上引资料，“学界风潮”始于壬寅之冬（或作光绪二十八年冬初），[36]较后时担任《苏报》主笔的章士钊（行严，1881～1973）且谓这一栏是“该报承南洋公学以墨水壶退学之余波”而增辟的。[37]按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退学事件发生于壬寅十月十七日（1902 年 11 月 16 日），“学界风潮”应是在此以后设立的，但因文献不足，无法确定其最初出现的日期。曾有学者检阅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所藏壬寅、癸卯年间残缺不全的《苏报》，指出这一栏之始见于该会所藏《苏报》者，为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

(1903 年 3 月 11 日),[38] 由是推断“实辟于癸卯年初”[39]。不过，现有的《苏报》影印本,由最先的一日——即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一日(1903 年 2 月 27 日)开始,已有‘学界风潮’一栏,实比上述日期，还早了十二天。再就报中内容，得知一月下旬已有。[40] 然则是否确实辟于癸卯之初，而非壬寅之冬，仍有待进一步的证明。

自此,《苏报》对于各地发生的学潮,均尽量予以报道,在言论上且加以同情及支持，“所载文章，素为东南学界所注目”[41]。又大量刊登学生来函，揭发各学堂的腐败情形，使学生的激烈情绪，得以宣泄，无形中成为鼓动学潮的旗手。论者已予指出，《苏报》虽然大量登载上海学界的活动情形，但其关心及影响并不仅局限于一地，各地学堂的消息亦可见于报中，大部分的报告是关于江苏、浙江两省，此外，尚可找到一些记载涉及至少其他九个省份的学堂；报上刊出的信件有远寄自湖南、湖北及北京者，广泛散布于各处的学堂学生并指望《苏报》为他们表明意见。所以，该报实已成为新学界的报纸。[42] 同时，在癸卯年的《苏报》上，亦可见到不少介绍留日学界状况的记事及留学生的函件，足以显示该报又是当时国内外年轻学生沟通意见的媒介之一。

还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苏报》的言论转趋激烈,行文中更逐渐流露了民族感情及仇满思想。很明显地，这是与学潮相互影响所致，因为庚子后满清政府威信扫地和新思想的灌输，均足以启发知识人士的民族意识，及促使他们摒弃了温和的改革政治方式而倾向排满革命。学潮一旦发生，不论其动机为何，但相激相荡的结果，必然增加了对清政府的不满、对守旧人士的愤恨，[43]《苏报》最后之演变成为一份革命报纸，与这一形势是分不开的。但如果认为《苏报》增辟‘学界风潮’乃‘宣传革命’之始,[44] 则未免过于强调，而与事实不符。因壬寅之冬的《苏报》，论文如《论废立之必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